

賈著：俄羅斯與辛亥革命

張 朋 園

Don C. Price. *Russia and the Root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, 1896-1911*
(Cambridge, Massachusettes,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 1974)

討論辛亥革命受外來的影響，多半強調英美法革命或思想界的關係，甚少有人注意到俄羅斯。再者，我們承認辛亥革命受外來的影響，却從不追問影響是何時開始的；影響是別人強加於我，或是我們脫出了自我中心的傳統觀念，放寬了眼界，看見了更廣闊的世界？賈世杰先生的「俄羅斯與辛亥革命」回答了這些問題，他所討論的是中國人視野的擴大，是俄國的影響。

這些主題非常吸引讀者的興趣，但賈先生所深入的一個中心問題：革命的道德感 (revolution morally oriented)，尤其值得我們注意。著者謂中國的革命係發自革命黨人內心的道德感，所以視革命為一種天職 (revolution as vocation)。因為有這一種道德感，所以才視死如歸，前仆後繼。

開宗明義，賈教授謂中國一百餘年來在帝國主義的壓迫下，處境險惡，歷經種種國際危機，任何國家都不會站在中華民族的立場說話。何況中國尚有遼闊的幅員，久遠的歷史文化，不可能讓國家民族的命運掌握在另一個國家民族的手裏。所以不要高估外來的影響。中國人要尋求一些靈感，乃出之於自己的意願。(緒論)

據賈博士的看法，中國人擴大他們的視野，始於嚴復和康有為。嚴復留學英國，接觸自由主義的思想，看見了科學革命以來的代議制度和自由平等的重要性。康有為原先是一個傳統主義者，當他接觸外來的讀物和西式的城市（香港和上海）之後，體會到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並不存在。他與嚴復一樣，珍視西方的自由平等觀念。然而如何才能使全國人民認識自由平等的重要，似乎非有一次知識的革命不可。就這樣，他們力為介紹西方的知識與觀念。與他們同時代的人也作同樣的努力。中國人的眼光擴大了，不僅看到了英、美、法諸大國，同時也知道了俄羅斯。

(第一章)

由於中國之急待維新，又由於尚在君主時代，如何而可以找到一個勤政愛民的模範君主作為榜樣，作為宣傳的具體說詞？俄大彼得（Peter the Great）竟被選中了。這是因為李提摩太（Timothy Richard）繙譯麥金則（Robert Machenzie）的泰西新史覽要（The Nineteenth Century: A History）的結果。在這本書中，大彼得深得同情，說他是一個好皇帝。康有為深信不疑，「俄彼得變政記」把俄羅斯說成了一個現代化的國家，彼得大帝備受推崇和讚美。（第二章）

但是，把大彼得當作維新改革的君主是一回事，認識俄國對中國的侵略又是一回事。俄人不以侵佔我貝加爾湖以東、大興安嶺以南近百萬方公里的土地為滿足，且向東北伸展，步步進逼。三國干涉還遼之後，強借旅大；拳亂之後，出兵東三省不退。中國人深深了解俄人的侵略野心。為了反對侵略，中國人的民族主義高張起來。（第三章）

大彼得對維新派的影響是短暫的，從康有為呈進「俄彼得變政記」至戊戌變法，為時不過一年。變法前半年，康有為已轉向日本的明治維新，認為日本才是真正的模範。加上俄人的侵略野心，中國對俄國的看法大異於前。從一九〇一年起，中國知識份子注意到了俄國的腐敗政局及革命運動的勃興。孫中山先生與俄之革命黨 Felix Volkhovsky 有所接觸，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大幅報導俄之革命動向。他們把俄之腐敗比喻清廷的腐敗，虛無黨受到無上的推崇。（第四章）

二十世紀初年，中國知識份子救國的手段有溫和與激烈之分，形成維新派與革命黨的對峙。兩派的方針雖然不一，俄羅斯虛無黨的活動却是彼此最好的宣傳材料。維新派認為虛無黨的炸彈可以逼成改革，革命黨則謂暗殺只是革命手段的一部份。雙方大開論戰，不同之處只是一念之間的出入而已。這種辯論於革命運動是很有利的。（第五章）

革命黨要求革命，維新派反對革命。要求與反對，是因為他們對於世界思潮演進的看法不同，對國際形勢的了解不同。但是，從事革命却根本是一種獻身，這一種獻身，發自一種德性——視革命為天職。梁啟超與革命黨都討論虛無黨，前者認定虛無黨是在要求立憲，後者則強調虛無黨是為了革命；前者解說以暗殺促成政治

的革新，後者則說暗殺就是革命，目標在推翻專制。（第六章與結論）

這大致是全書的結構和主題，不難看出其革命道德感的中心論點。著者指出革命的道德感存在於儒家的思想中；儒家的成仁與取義就是要犧牲小我以完成大我。這是一個很獨到的看法。我們讀盡全書會得到一個感覺：賈先生以甚多的篇幅討論維新派對俄羅斯的看法。由於維新派（尤其是梁啟超）對於時勢有因時而異的反應，自身的處境又受到許多限制，時而以光緒比大彼得，時而鼓勵中國亦需要虛無黨。但是革命黨並不討論大彼得，有關虛無黨的文字也遠不如維新派那麼多。革命黨所注意的，是俄羅斯的帝國主義。梁啟超與革命黨論戰，指出帝國主義險惡，隨時有瓜分中國的可能，中國不宜革命，否則自身的動亂將予帝國主義者可逞之機。革命黨認為不然。他們說國際間有互相尊重的道德存在，列強不會瓜分中國。面對當前的凶惡帝國主義，革命黨是否言不由衷？著者說，不是的。革命黨人的確相信國際間有正義和真理的存在，中國絕無被瓜分的危險。歸納起來，著者討論革命黨的道德觀，一面是要求自我的犧牲，一面是肯定國際間的正義與公理，娓娓道來，頗為引人入勝。

這是研究辛亥革命史的人值得一讀的著作。我個人獲益最多的是賈先生討論康有為受大彼得的影響。康氏將大彼得看成一個賢明的君主，他的認識是否正確？舊日我們的外國史教科書無不受康有為的影響，一致稱道大彼得英明進取；其所以潛赴荷蘭當碼頭工人，學習西方技藝，乃希望將俄羅斯變成英美一樣的富強。豈知這只是同情者的說法而已。大彼得的本來面目，與亞歷山大二世或尼古拉二世等暴君原無二致，他不過想利用西方的技術以鞏固個人的權位，那裏會注意到其慘絕人寰的農奴社會。

對康有為最有影響的，是麥金則的泰西新史覽要。這本書原極同情大彼德，加上譯者李提摩太也是一個同情者，大彼得就成了聖主明君。康有為對彼得的印象由此而來。由於先入為主觀念的影響，所有受康氏領導的維新派無不與之同一論調，甚而對於客觀公正的著作亦不惜加以歪曲。徐景羅與傳教士 Frederick Galpin 合譯的俄史輯譯 (History of Russia) 竟將原著者 Walter Kelly 指責大彼得暴虐無道之處完全省略；大彼得以細故殺害其子的殘酷行為，竟然隻字不提。

西方學者研究中國歷史有一個我們所不及的長處，當他們討論外來著作對中國的影響，通常都會深入核對有關譯文，發掘譯者的斷章取義或曲解文義。賈先生對此所下功力尤為突出，他不僅指出俄史輯譯的不忠實，他種譯述，如煙山專太郎的「魯國革命黨今昔」、「近世無政府主義」，Alexis Krausse 的「帝俄亞洲侵略史」(Russia in Asia)，Volkhovsky 的 The Hope and Fear of Russia 諸作，在仔細核對之下，亦發現了許多不實不盡之處。例如梁啓超的「俄人之自由思想」乃取材於 Volkhovsky 之作，站在維新派的立場，梁氏不惜歪曲原作的本意；原作指責尼古拉二世專制無道，梁竟一筆代過。梁啓超之所以如此，是要將尼古拉二世比做光緒皇帝之故。

本書的長處甚多，加上著者的文字細膩，分析入微；而且史料包羅宏富，用力至勤，真正做到了史學與文學的合璧。當然，任何著作皆難於令其讀者完全滿足。就是著者事後也會感到有不盡稱心之處。賈先生曾對我說，如果他能重寫該書，第一要改寫的是「革命的天職」一章。他的意思是，中國的革命受儒家影響深刻，應該多發揮「捨身取義、殺身成仁」的涵意。是的，雖然本書的緒論與結論都已提到儒家影響知識分子，似乎尚有意猶未盡之感。

其次是主題與章節平衡的問題。本書討論俄國對辛亥革命的影響，而維新派人所佔的篇幅超過了革命黨。我們不能否認維新運動與辛亥革命的根源有密切關係，但是討論革命黨方面的比重似乎輕了一點。這或許正如著者所言，是因為革命黨多半注意俄之帝國主義而未深入俄人革命活動之故。

書中有一個看法值得商榷。著者說徐景羅同情大彼得處死其子，乃基於傳統的「孝」義（頁37），按中國雖然受「孝」義影響甚深，降至清末，父親已無處死子女之權力。要之，這只能說是「君要臣死，臣不敢不死」——「孝」義過份延伸的結果。其次，書中有幾個小的錯誤：(一)「羅樸」應為「羅普」（頁280）；(二)頁233之註38應為第二章之註39；(三)頁103與102之內容倒置，此為印刷上的誤置。

這些只是極微小的瑕疵，不足以影響全書的成就。在此，我推薦研究辛亥革命的人一讀賈博士之著。